

## 冶遊、城市記憶與文化傳繹： 以王韜與成島柳北為中心\*

呂文翠

國立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系

### 前言

本文擬探討明清冶遊文學在晚清上海文學以及日本明治維新時期東京城市文學發展過程所起的作用，特別關注明清之際著名文人余懷記述南京秦淮河畔青樓文化興衰的《板橋雜記》之影響印痕。晚清上海文壇仿余著者甚多，王韜(1828–1897)<sup>1</sup>以滬地青樓北里滄桑寄寓家國身世之感的《海陔冶遊錄》便是著名例證。從十九世紀中葉以降的東亞視域著手，作為東亞漢文學圈共同的文化資源，《板橋雜記》在日本明治維新時期之後續迴響亦相當可觀：日本幕府末葉與明治維新之際的文士成島柳北

---

\* 本文係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重探東亞現代性：家國、自我、情感之形構——從異文化流動視角看晚清上海社會文化觀念之生成衍繹」(計畫編號：NSC98-2410-H-008-071-MY2)之部份研究成果。論文撰寫過程中，承蒙日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大木康教授惠賜奎章閣版《柳橋新誌》一書，並協助於東京大學圖書館影印該館珍藏之《花月新誌》期刊內容，增益拙文，謹此一併致謝。

<sup>1</sup> 王韜，江蘇長洲(今蘇州甯直)人，原名利賓，改名瀚，後改名韜，字仲弢，又字子潛，一字紫詮，晚號弢園老人。二十一歲(1849)應英國傳教士麥都思(Walter H. Medhurst)之邀，到上海墨海書館任編輯，歷時十三年。撰有《西學圖說》、《泰西著述考》等書。因上書太平軍官員，獻策攻打上海，被清政府通緝，1862年避居香港。1873年與黃平甫在香港集資創立中華印務總局，出版其所輯撰的《普法戰紀》等書。次年創辦《循環日報》，任主筆，撰寫政論。1884年回上海，時而為《申報》撰寫時評，次年創立弢園印書局。1885年，任上海格致書院(1875年創辦)山長。1897年5月在上海逝世，年六十九歲。一生文學、史學、科學著作甚豐，有《蘅華館日記》、《蘅華館詩錄》、《遯窟調言》、《歇浦芳叢志》、《瑤台小錄》、《甕牖餘談》、《瀛壖雜誌》、《淞隱漫錄》、《淞濱瑣話》、《漫遊隨錄》、《弢園尺牘》、《弢園叢書》、《豔史叢鈔》、《滬城聞見錄》、《格致書院課藝》、《泰西著述考》、《法國志略》、《普法戰紀》、《美利堅志》、《俄志》、《日本通中國考》、《琉球朝貢考》、《火器略說》等著作出版。

(1837–1884)<sup>2</sup>記敘江戶時期吉原地區「遊里」<sup>3</sup>空間的《柳橋新誌》，即體現了《板橋雜記》的文化印痕，一方面呼應了寺門靜軒在《江戶繁昌記》中借城市興衰史嘲諷時政或月旦當代人物的筆調，亦提供我們嶄新視角審視晚清時期「漢文學」在西潮東漸的文化語境中如何傳譯與轉化，並與在地文化碰撞出複雜多元的意義。另一方面，除了擅長描摹大城風月事蹟與遊里興衰之外，王韜與成島柳北的著作更展現出中日文人面對來勢洶洶的西方文明與思潮的深刻思索，幽微地揭示出他們於風月冶遊書中寄藏「傷今思古」深意，從中梳理個人與歷史的文化記憶，並創造嶄新文化傳譯的豐富內涵。

### 冶遊與城市變遷

光緒五年(1879)，在香港的王韜因《普法戰紀》的刊行名滿東瀛，<sup>4</sup>受邀訪日。閏三月初七日，王韜從香港道經上海，轉赴東瀛。龜谷行在王韜《扶桑遊記》上卷的跋文中對此行緣由有詳細說明：

<sup>2</sup> 成島柳北，江戶(今東京)人，名惟宏，後易為弘，字叔屬，後為保民，初號確堂，後易為柳北，又號甲子太郎，筆名何有仙史、墨上漁史、墨上仙史。柳北家世代為幕府儒官，任將軍侍讀。自幼熟讀儒家經典，十八歲繼承父祖之業，任侍讀見習。先後為將軍德川定家、德川家茂擔任侍講。主張學習西學有助於國事，自修英語、荷蘭語以及西方兵器軍事等。1865年，幕府改革兵制，命柳北為騎兵統領，其後歷任外國事務總理、會計副總裁等職。維新後，隨著幕府政權的消失而下野，終生不仕新朝。明治十年(1877)創刊《花月新誌》詩文雜誌，專載花月風流韻事、漢詩文與和歌和文等，至明治十七年(1884)十月柳北逝世前共發行一百五十五號。柳北亦曾為矢野文雄政治小說《經國美談》、菊池三溪和文體小說《本朝虞初新誌》寫下評點。此外，也為依田學海《新評戲曲十種》作序，評閱並刊行了怕悅堂《第五才子書水滸傳》十七冊，其漢詩作品流傳多至兩三百首。1874年擔任《朝野新聞》社主筆，辛辣批評時政。參見前田愛：《成島柳北》，收入《前田愛著作集》第1卷(東京：筑摩書房，1989年；與《幕末・維新期の文学》同刊)，頁544–51；三浦叶：《明治漢文學史》(東京：汲古書院，1998年)，頁95；李進益：〈明清小說對日本漢文小說影響之研究〉(臺北：中國文化大學博士論文，1993年)，頁168–69；高文漢：《日本近代漢文學》(銀川：寧夏人民出版社，2005年)，頁70；孫虎堂：〈略論成島柳北及其漢文小說《柳橋新誌》——兼論日本19世紀的花柳類漢文小說〉，《蘭州學刊》2008年第8期，頁192；Richard John Lynn, “Huang Zunxian and His Association with Meiji Era Japanese Literati (*Bunjin*): The Formation of the Early Meiji Canon of *Kanshi*,” *Japan Review* 15 (2003), p. 117。

<sup>3</sup> 即日文的風月歡場、青樓妓院之意，亦有「遊廓」一稱。參見沖浦和光(著)、桑田草(譯)：《極樂惡所：日本社會的風月演化》(臺北：麥田出版社，2008年)，頁135–37。

<sup>4</sup> 《普法戰紀》一系列文章不定時連載於《申報》，時間自1874年1月8日至1874年11月9日止，長達近一年。不久，《普法戰紀》全書十四卷於香港發行，在上海也由申報館代售，並很快地流傳到日本。

戊寅之春，余與栗本匏菴、佐田白茅探梅於龜井戶，歸途飲於柳島，匏菴曰：「吾聞有弢園王先生者，今寓粵東，學博而材偉，足跡殆遍海外，曾讀其《普法戰紀》，行文雄奇，其人可想，若得飄然來游，願為東道主。」白茅曰：「善矣。」余友寺田士弧曾至南海，<sup>5</sup>與先生善，乃有東游之約。士弧與重野成齋、岡鹿門諸人，謀欲邀之。余告以匏菴言，於是成齋始與匏菴交。匏菴每置酒會友，未嘗不津津乎王先生也。己卯之夏，先生遂航海而至，居二月，付此書於匏菴而去。頃匏菴將梓之，<sup>6</sup>余謂是區區日記耳，未足以窺先生之學，然豪宕蕭灑之概，亦可以見矣。<sup>7</sup>

這說明在日本與王韜密切往來的友人包括：曾派駐朝鮮的外交官佐田白茅、東京圖書館館長岡千仞、留學過英國的學界名士中村正直、<sup>8</sup>文學家龜谷行、日本《郵便報知新聞》主筆，也是邀請王韜訪日的靈魂人物栗本鋤雲、<sup>9</sup>重野安繹（當時任修史館編修）等，可謂明治維新初期朝野各界與開明知識社群之佼佼者，<sup>10</sup>皆不約而同深受王韜最新出版的歐洲戰史吸引。此外，以創作仿「聊齋體」聞名，曾著志怪漢文小說集

<sup>5</sup> 關於日本名士往香港拜訪王韜事，參見周佳榮：〈在香港與王韜會面——中日兩國名士的訪港記錄〉，載林啟彥、黃文江（主編）：《王韜與近代世界》（香港：香港教育圖書公司，2000年），頁375-94。

<sup>6</sup> 此處說的是王韜旅日回國後，將《扶桑遊記》書稿寄給日本友人，即由栗本鋤雲在東京報知社印局以最快速度標點出版，見王立群：《中國早期口岸知識份子形成的文化特徵——王韜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頁205；但此版本中所載日本的「海防、兵政、軍艦、參壘，悉被刪去，紀遊之作有涉於載酒看花者，亦經沈梅史州守所節，蓋有所諱也」，因此王韜在〈弢園著述總目〉接著提到：「殊不滿鄙臆，尚待重刊。」見王韜：《弢園文新編》（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8年），頁376。今本《扶桑遊記》多據明治十二、十三年（1879、1880）報知社印本重刊，見游秀雲：《王韜小說三書研究》（臺北：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06年），頁45。

<sup>7</sup> 《扶桑遊記》（臺北：台海出版社影印木下彪藏本，1971年），龜谷行上卷〈跋〉。

<sup>8</sup> 1871年，中村正直翻譯十九世紀英國思想家斯邁爾斯（Samuel Smiles）的《自助論》（*Self-Help*），並以《西國立志編》為名，將此書付梓出版，轟動一時。此外，他亦曾翻譯穆勒（John Stuart Mill）的《自由論》（*On Liberty*）。見王晴佳：〈中國近代「新史學」的日本背景——清末的「史界革命」和日本的「文明史學」〉，《臺大歷史學報》第32期（2003年12月），頁197。

<sup>9</sup> 栗本鋤雲（1822-1879）名鯤，號鋤雲，別號匏菴，漢學家。在〈王紫詮之來遊〉一文中便提到初讀《普法戰紀》的感想：「竊以為該書不獨記行陣之事、交戰之跡，而其中議論能脫出漢人之漏舊，此為珍貴之書。」此文原為日文，見《匏菴遺稿》；轉引自徐興慶：〈王韜與日本維新人物之思想比較〉，《臺大文史哲學報》第64期（2006年5月），頁137。

<sup>10</sup> 參見三浦叶：《明治漢文學史》，〈王韜の來日と都下の詩壇〉，頁13-19。

《夜窗鬼談》的漢文學家石川英(鴻齋)、<sup>11</sup>日本皇族源氏後人的學者大河內輝聲(源桂閣)、漢學家森春濤,也與王韜有眾多詩文唱和往還,足見王韜與《普法戰紀》建立的文化交流氛圍,遍及新舊派日東文人。

綜觀在日本這段期間,王韜參與詩社,訪問報館(郵便報知新聞社),遊覽「崎陽、神戶、浪華、西京、江戶」諸名山勝境,更與眾多新舊派仕紳菁英聚談冶遊,詩文贈答往還,勾留百日後,回程之時,「日之賢士大夫踐別於中村酒樓,星使參贊以下至者百有餘人」,盛況空前,「日人謂自開國數千年來所未有也」。<sup>12</sup>七月十五日復返滬上,終於抵歸香港,不久王韜便將這段遊歷的詳細經過以日記體裁記述於三卷《扶桑遊記》中。

當然,在香港已經陸續編撰明清以降諸種記載風月事蹟為《豔史叢鈔》的王韜,在此期間更不會錯過尋花問柳、體味東瀛青樓風光的機會。《扶桑遊記》就提到:「〔本多〕正訥約卜日作兩國橋青柳樓之遊,其地頗多名勝,距此二三里而遙,有妙齡之妓,反身貼地,口銜玉盃,如梁羊侃傳所載,旖旎風流得未曾有。余聞東京柳橋多佳麗,與新橋相埒。近人成島柳北,曾著《柳橋新誌》,頗述其豔冶狀,會當一遊以領略此異地烟花、殊鄉風月耳。」<sup>13</sup>可見循成島柳北的漢文著作《柳橋新誌》<sup>14</sup>所載豔跡一遊,為王韜在東京著名的風月區新橋、柳橋時提供了按圖索驥「殊鄉風月」的門徑。這樣的文字因緣與親身印證,使得光緒十年(1884)在合肥傅相李鴻章默許下回到上海定居的王韜,不久在申報館創辦的通俗報刊《點石齋畫報》上連載聊齋體

<sup>11</sup> 見石川英為王韜《蘅華館詩錄》所撰序文,見王韜(著)、石川鴻齋(訓點):《蘅華館詩錄》(東京:山中市兵衛,1881年)。王韜在日本與名士往來並為漢學家詩集作序事,參見夏曉虹:《返回現場:晚清人物尋蹤》(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年),頁5-8。

<sup>12</sup> 《毀園文新編》,頁370。文中所謂「中村樓」位於東京兩國橋東畔,為明治初年文人雅集或召開書畫會的聚會之所,《柳橋新誌》中多處提及:「就中酒肴最佳者川長也。……中村等家,則俗稱貸席者,而為右軍道子之書畫,會陶朱猗頓之釀金,會及歌舞插花之師,開業試技者,假以排筵募眾也。」見《柳橋新誌》初編,明治七年(1874)奎章閣版(東京:日本近代文學館,1971年),頁七上。說明此樓經常出借場地舉辦歌舞、花道或書畫會,如資深的妓女在此開書畫會的例子:「去年房八婆開書畫會于中村樓,當日諸先生皆臨焉,賓客之盛,賀金之夥,近來無比,人皆稱其會曰滅法會,豈不妙乎?余屢往彼宅,未曾見彼摩墨舐毫抹所謂漢字者,而為書畫會先生,真是不可思議。」見《柳橋新誌》二編,頁二二下。諷刺妓女假冒風雅名士,搬弄玄虛以掙得聲名的最佳場地,當在「中村樓」;另萩原乙彥的《東京開化繁昌誌》(1874)稱其「外飾風流內實野鄙」,高見沢茂《東京開化繁昌誌》也提到「嗚呼風流場中此殺風景了リ」,見賴毓芝:〈伏流潛借:1870年代上海的日本網絡與任伯年作品中的日本養分〉,《美術史研究集刊》第14期(2004年3月),頁164。本文採用的《柳橋新誌》初編與二編均為明治七年奎章閣版。

<sup>13</sup> 《扶桑遊記》,卷上,頁十八上至十八下。

<sup>14</sup> 《柳橋新誌》初編稿成並追補於1860年,二編稿成於1871年。見前田愛:《成島柳北》,頁547-50。

小說《淞隱漫錄》，其中〈柳橋豔跡記〉即是柳橋青樓風月的全景式描繪。文中多處段落即轉化自成島柳北《柳橋新誌》初編，將〈柳橋豔跡記〉視為《柳橋新誌》初編的濃縮版亦不為過。<sup>15</sup>

從個人生命史與出版史看來，王韜自1862年避禍至香港，但他在上海文化圈的影響力卻不容小覷，<sup>16</sup>如1875年起便在滬地陸續出版的《海陬冶遊錄》等一系列書籍，可說是最早以上海一地青樓為主要敘事題材的先行典範。在該書序言中，王韜已表明此著旨在滬地青樓北里滄桑變化，寄寓家國身世之感與城市變遷軌跡，故當

<sup>15</sup> 如王韜〈柳橋豔跡記〉開篇云：「橋以柳名，並無一柳。前輩謂橋之東南故有垂柳一株，臨風披拂，橋得名以此。或曰非也，橋建於柳原之末造，故云。」載《淞隱漫錄》（臺北：廣文書局，1976年），頁318。此段文字乃成島柳北《柳橋新誌》初編卷首「橋以柳為名，而不植一株之柳，舊地誌云：『以其在柳原之末命焉，而橋之東南有一橋，傍有老柳一樹，人呼為故柳橋。』」（頁一上）一段文字之轉化。王韜文章更多處援引《柳橋新誌》初編對該地青樓的描述，如：「柳橋之妓妝飾淡雅，意趣疎媚」（《淞隱漫錄》，頁318；引自《柳橋新誌》初編，頁二上）、「應接賓客則船家之妻也。口齒伶俐，世俗目之為女將軍」（《淞隱漫錄》，頁318；引自《柳橋新誌》初編，頁四下）、「江都素尚繁華，十步一店，百步一樓，松江之鱸，京江之酒，可立致也。其著名者曰川長，在橋北曰龜清，橋南曰深川，他若丸竹、松亭，指不勝僂。其中芳饌珍羞，山堆坻積，惟鮮魚則取之於河岸。客至，先供茶果，炙魚羹鱠，以次而陳。夏月必設浴室，為客製浴衣，膚涼體爽，其飲自倍。浴室最佳則推柏屋，風雪之夕，可以融凍；酩酊之候，可以解醒」（《淞隱漫錄》，頁318-19；引自《柳橋新誌》初編，頁六下至八上）、「妓有定價，大妓晝夜八銖，小妓半之；客於定價外有所賞謂之『花』。大小妓衣服之制亦有別，大妓曳衣於地，以左手扱而行，衽衣之襟白；小妓褰束於腰，衽衣之襟紅」（《淞隱漫錄》，頁319；引自《柳橋新誌》初編，頁十二下至十三上）、「奴之陪妓也，將彈絃則為接莖懸線，方更衣則為熨裳斂帶，遇雨即歸取傘，逮暮即走點燈，妓有狎客則必識之。噫！以七尺之軀，于思之髯，甘為賤女子役，結鞶理屐以媚其意，僅利數百錢，其辱何如哉！妓於春夏盛時，一月或有五六十席，席價謂之『玉』，記客數者呼之為『玉簿』。妓等每相問，必曰：『今月獲玉幾何？』競誇其多，以為榮劣」（《淞隱漫錄》，頁320；引自《柳橋新誌》初編，頁十九下至二十上）、「柳橋之妓色藝兼擅者，自阿金至駒吉，殆不下數十人。聞自開府以來，都下名姝，姿容絕世，識字知書，足以馳名於北里、標豔於鞠部者，殊不乏人，而尤以二州橋東之阿菊為超羣拔萃焉。阿菊性豪邁，喜揮霍。自出巨貲營高樓於墨水之西，榜曰『水明樓』。四面窗櫺，軒爽宏敞，墨川如帶，宛在目前，自建此樓，其名頓播，豪士冶郎，無不入而買醉焉。斯則妓中巨擘，可為柳橋光矣」（《淞隱漫錄》，頁320；引自《柳橋新誌》初編，頁二四下至二六上），皆可見王韜撰〈柳橋豔跡記〉明顯參照與轉化成島柳北之《柳橋新誌》初編。

<sup>16</sup> 王韜描述滬北靜安寺、城西蔽竹山房（禪寺「鐸庵」）、黃浦西村龍華寺的文章，以城中名寺的滄桑變化，側面紀錄了走向現代化的新興都市社會風俗的變遷，這些文章後來收入王韜所著《瀛壖雜誌》中。見申報館（編）：《瀛寰瑣紀》（上海：申報館），第十二卷（同治十二年〔1873〕八月），頁二十下至二一上。

時文人以「且軼板橋雜記之編」<sup>17</sup>讚譽其深得余懷《板橋雜記》「月旦勸懲」的筆法神髓。前面已經提到，1879年王韜印行了由他所編撰的《豔史叢鈔》，分別收入從清初余懷《板橋雜記》以降，主要記述江南等地風月事蹟的相關書籍。<sup>18</sup>此叢書後半部主要由王韜自己的《海陬冶遊錄》、《海陬冶遊附錄》、《海陬冶遊餘錄》以及《花國劇談》所構成，數量之龐大，說明了王氏在這類書籍上獲得的豐碩成果，與他最為後人所稱道的諸多政論書籍或獨樹一格的報章體文章比較，並不稍遜。

放大來看當時上海的出版環境，從十九世紀七十年代中期開始，申報館發行的一系列冶遊書風行，光是重新排印明清以來的筆記作品就有：捧花生《三十春小譜》、西溪山人《吳門畫舫錄》、箇中生《吳門畫舫續錄》、李斗《揚州畫舫錄》、捧花生《秦淮畫舫錄》、《畫舫餘譚》、許豫《白門新柳記》、《白門衰柳附記》等等。《申報》主筆錢昕伯、何桂笙、蔡爾康在這樣的「秦淮追憶」氛圍中，遂欲共同編輯呈現「申江」特色的《春江花月志》。雖然此書終究沒有結集付梓，<sup>19</sup>但卻使書市上瀟灑的秦淮風月從此為之一變，逐漸由申浦風格取而代之。固然如王韜所言，這部若出版將「以繼秦淮、吳門畫舫之後，誠花國之劇談，盛時之雅事也」，<sup>20</sup>讀者可藉此重新溯回秦淮與蘇州的流風餘韻。若從1880年前後出現的風月書籍看來，此書的構思模式，已代表這類書刊環繞春江而激起漣漪，預告了日後海上豔書的全盛時期。自《申報》登出〈擬刻《春江花月志》徵諸同人品題著作小啟〉，隔月（五月廿七日）已有滬地冶遊、品評上海妓女的詩作：古吳莫釐峰樵的〈癸酉夏孟申江紀游〉，<sup>21</sup>可見由《申報》主筆群引領的風潮之一端，鄒弢在1884年出版的《春江燈市錄（海上花天酒地傳）》、《春江花史》<sup>22</sup>更正式以「春江」為名品花評月，見證春申的風華豔跡。

<sup>17</sup> 嶺南護落花人：〈《海陬冶遊錄》序〉，頁一下；收入玉鮎生（王韜）等：《豔史叢鈔》（臺北：廣文書局，1976年），下冊，頁532。

<sup>18</sup> 內容有《板橋雜記》、《吳門畫舫錄》、《吳門畫舫續錄》、《續板橋雜記》、《雪鴻小記》、《秦淮畫舫錄》、《畫舫餘譚》、《白門新柳記》、《白門衰柳附記》、《十洲春語》、《竹西花事小錄》等。

<sup>19</sup> 《申報》在同治十二年四月二十一日開始刊登〈擬刻《春江花月志》徵諸同人品題著作小啟〉，揭開了《申報》月旦花月的序幕，也顯示這一構想確出於早期《申報》筆政。

<sup>20</sup> 王韜語「近聞山陰太痴生、苔溪修月樓主人、滬濱縷馨僊史將撰《春江花月志》」，見〈《海陬冶遊錄》自序并引〉，申報館（輯）：《四溟瑣記》（上海：申報館），第八卷（1875年），頁十七上。王韜《海陬冶遊餘錄》提到「曩滬上縷馨仙史有擬刻《春江花月志》啟，原思廣為網羅，以張豔麗，後卒無好事者贊成其事」，可見此書終未能付梓。收入《豔史叢鈔》，下冊，頁741。

<sup>21</sup> 見《申報》同治十二年五月念七日，頁2。

<sup>22</sup> 上海圖書館館藏鄒弢的《春江花史》（上海：二石軒，1884年）內容共三卷，分兩部份，第一部份有利卷、貞卷，為《春江花史》卷一、二，第二部份為亨卷，為《春江燈市錄（海上花天酒地傳）》卷二（上海：二石軒，1884年）。

這類書籍同時與滬地采風的筆記圖籍與上海旅遊指南的書寫風尚相呼應，如本著「開眼看世界」的編輯旨趣印行的套書《小方壺齋輿地叢鈔》(由王錫祺編纂)第九帙，即是專載海禁開放後沿海港口風土情勢的一系列書，其中又以記述上海城的筆記書最值得注意。當時各式各樣琳瑯滿目以上海通自詡，或勸誡讀者勿蹈迷津的雜紀、竹枝詞、遊記、圖說，如黃楸材《滬遊脞記》(1866)、王韜《瀛壖雜誌》(1875)、葛元煦《滬遊雜記》(1876)、黃式權《淞南夢影錄》(1884)、辰橋《申江百詠》(1877)、池志徵《滬遊夢影》(1893)、指迷生《海上冶遊備覽》(1894)等；繪冊畫報如點石齋出版的《申江勝景圖》(1884)以及管可壽齋書局的《申江名勝圖說》(1884)，其他如《海上繁華圖》(1884)、《申江時下勝景圖說》(1894)、《新輯上海彝場景致》(1894)、《海上遊戲圖說》(1898)、《繪圖上海雜記》(1905)等，在書市中佔據愈來愈大的版圖。甚至大量以「名妓」為主題的「上海青樓」寫真圖記或筆記，如前面提到的1884年出版的《春江花史》、《海上花天酒地傳》、《海上群芳譜》、《上海品豔百花圖》、1888年的《淞濱華影》、1894年的《海上青樓圖記》等等，都呈現了開埠以來上海洋場經過將近五十年西潮衝擊沉澱後的多元文化與城市圖景。<sup>23</sup>

因此可以說，這些青樓風月書與城市旅遊指南的合流與相互作用，呈現了東亞第一大國際港埠上海城市新興崛起的訊息，也透露了傳統文化與泰西文明的衝擊與交融，時代轉接過渡期間釋放的種種動力與豐富能量。基於這樣的關懷基調，可以想見王韜對成島柳北在《柳橋新誌》初編(1859年出版)〈自序〉中提及該書藉風月事蹟諷諭邦城興衰的題旨，自然深有共鳴：

往日有靜軒居士者，著《江戶繁昌記》，備摸八百八街之景狀，勝場劇區，無所不載，無所不說，其文極詼謔，而其事則明詳，使讀者臥知其地之所有，雖有諳熟闔都風俗之人，亦不能附益一事也。然其距今過二十年，物換俗移，地之熱鬧冷索相變者，不為少矣！往時新地深川之妓院，綺羅為叢者，今乃索然無踪，神明芳坊之變童肆與娼樓相抗者，亦寥乎斂影，其他各處之繁華，日衰月瘠，能及古者鮮矣。若芳原品川亦比當日所說則減五六分。嗚呼！使居士觀方今之狀，將愕然而驚，慨然而嘆，不知其人尚存否？然此大都之繁華，奚其可掃地而盡矣，微于古而盛于今者亦有焉，柳橋是也。……余也狂愚一書生，凹硯禿筆，僅糊其口者，無居士之才，無居士之學，加之赤貧如洗，未曾一日遊其境而驗其實，焉足記之？然喜聞蕩子之說話，觀市街之圖冊，得窺其槩畧。

<sup>23</sup> 針對晚清上海青樓文學與城市敘述的密切關係，筆者〈巴黎魅影的海上顯相——晚清「域外」小說與地方想像〉中有詳細討論，然本文偏向闡發東亞現代性，兩文取向不同，但可以互相補充。見呂文翠：《海上傾城：上海文學與文化的轉異，1849-1908》(臺北：麥田出版社，2009年)，頁40-72。

寺門靜軒<sup>24</sup>以漢文撰寫，於1831年稿成，於1835年發售的《江戶繁昌記》，<sup>25</sup>無疑是成島柳北追摹的經典之作。《柳橋新誌》二編文末類似跋文的總結，復又以靜軒居士其人其文為夙昔典範：「昔靜軒翁著《繁昌記》，當時幕吏怒其誹謗之語，繫翁於獄，焚其書，鳴其罪，竟逐之，世笑其吏之局量偏隘，而翁之書猶行于今焉。」<sup>26</sup>指出柳橋一地早就將新地深川的舊日風華取而代之，而成島柳北效倣靜軒居士，以諧謔諷刺筆法將時代感遇寄寓於城市書寫之中，自然將焦點聚集於東京之首要繁華勝地「柳橋」。也因此，撰寫東京柳橋的變遷與青樓花月誌，不啻為歷歷記載幕末（江戶時代）到明治維新時期東京一地新舊文化推移嬗遞的軌跡。《柳橋新誌》二編撰寫的動機，便欲如實再現十數年間東京城「世移物換」與「王政一新」的社會百態：

余曾著《柳橋新誌》，距今既十有二年。當時自以為善記其新，而讀者亦或喜其新焉。爾來世移物換，柳橋遊趣一變，而《新誌》亦既腐矣。德川氏西遷之後，東京府內朱門粉壁變為桑茶之園者不鮮，而柳橋妓輩依然不失其業，操管絃馳逐于風流場中，比諸幕吏免脫鼠伏而偷生者，豈不優哉？蓋王政一新而柳橋亦一新，而未有好事者記其新也。<sup>27</sup>

我們誠可從十九世紀七十年代城市史的視角，深入探析王韜與成島柳北的青樓風月誌再現的社會過渡期之都會形貌，得窺晚清上海與明治維新初期東京等地城市文化變遷之一斑。

值得一提的是，《申報》館創辦的第一份文藝雜誌《瀛寰瑣紀》中，就曾刊出過署名靜軒居士的《江戶繁昌記》三則段落。<sup>28</sup>稍晚，《滬遊雜記》（葛元煦著，1876出版）這部最具系統地介紹滬地洋場風貌的城市指南書出版不到兩年（1878），即由日本藤堂良駿訓點，易名為《上海繁昌記》在東京出版，成為十九世紀七十年代中末葉東瀛人士道經上海來華行旅的重要參考書籍。由這幾部以「繁昌記」為名的城市書交織出的面相，更讓我們進一步審視晚清時期漢文學在西潮東漸的東亞文化語境中，如何傳譯或轉化，並與當地文化圈碰撞出或矛盾或交融的複雜意義。

<sup>24</sup> 寺門靜軒（1796–1868），名良，字溫，通稱彌五左衛門，江戶人。其父為地方藩儒的藩士，自幼即隨父往返江戶。靜軒二十歲時，冀望得到藩侯的拔擢而成為地方藩儒，然終落空，此後即以著述為生。參見李進益：〈明清小說對日本漢文小說影響之研究〉，頁27。

<sup>25</sup> 《江戶繁昌記》共有五編，由天保二年（1831）至天保七年（1836）為止，共計五年刊完，出處同上注。

<sup>26</sup> 《柳橋新誌》二編，頁二七上。

<sup>27</sup> 同上注，頁一上至一下。

<sup>28</sup> 文中描述吉原的花街柳巷、戲園、混堂（泡澡處）以及祭祀賽會等江戶都下風俗，見《瀛寰瑣紀》，第二十四至二十六卷（同治甲戌年〔1874〕八月至十月）：第二十四卷，頁十五上至十七下；第二十五卷，頁十六上至十七下；第二十六卷，頁十七上至十八下。



王韜也曾經在〈讀日本《東京繁昌記》〉<sup>29</sup>一文中，揭示彼時眾多志書、繁昌記的諷喻之旨：

志書之流，近時夥矣，或記方隅，或錄異域，或追想今昔之盛衰。如《洛陽伽藍記》、《東京夢華錄》，猶令見之者歛歔想慕不已。江戶為都會名區，固繁華藪澤也。其間如樓臺之崇綺，園囿之廣深，士女之便娟，民物之殷闐，海外諸國無不薈萃於此，賈胡列貨於市廛，火齊、木難，光怪陸離，不可方物，以至魚龍蔓衍，變幻萬狀，而平康曲里，窈窕其容，麗都其服，燈火笙歌，徹夜不絕，錄此者殆侈其盛歟？然有太盛必有衰，不可恃也。惟為上者有以持盈保泰，去其僭侈而汰其靡麗，使之務適於中。古者國奢則示之以儉，國儉則示之以禮，是所望於主持風會之君子。<sup>30</sup>

此類書籍固然是描述青樓平康的繁盛，亦更加體現了東京城的輝煌時代，說明日本漢文著作的城市書寫與青樓風月誌往往一體兩面地顯示出時代移轉的徵狀和矛盾面相，<sup>31</sup>固然如王氏文末所言，足以作為在上位者體察民情並矯正風氣的依據，但現在來看，更重要的是它們提供了一個時代的橫向剖面，揭示近代日本面對泰西文化與現代文明衝擊的種種回應、排斥情狀的具體縮影，從另一視角為十九世紀中日城市史的發展變遷留下見證。

### 秦淮風月的江戶洄潮與海上遺緒

誠如多位學者所指出，明清之際著名文人余懷<sup>32</sup>記述南京秦淮河畔青樓文化興衰變化的《板橋雜記》，不約而同成為晚清上海文壇與日本江戶時期以至明治維新初期漢

<sup>29</sup> 此書有一可能就是《江戶繁昌記》，另一可能是1876年出版的《東京新繁昌記》（服部撫松著）。王韜《扶桑遊記》曾記載日本漢學大儒島田重禮在東京拜訪他，並「以《東京新繁昌志》見貽」（卷上，頁二九下）。事實上，日本文化圈自十九世紀七十、八十年代就有多部以「繁昌記」為名的著作相繼問世，如《田舍繁昌記》（松本萬年，1875年）、《東京新繁昌記》（服部撫松，1876年）、《大阪繁昌記》（石田魯門，1877年）、《大阪繁昌記》（奧澤信行，1877年）、《善光寺繁昌記》（長尾無墨，1878年）、《岡山繁昌記》（玉置正太郎，1879年）、《新編東京繁昌記》（吉田喜七，1881年）、《函館繁昌記》（高須墨浦，1884年）、《新瀉繁昌記》（岡田有邦，1884年），皆可證《江戶繁昌記》鼓蕩起的潮流，蔚然可觀。參見三浦叶：《明治漢文學史》，頁97-100。

<sup>30</sup> 見王韜：〈讀日本《東京繁昌記》〉，載《弢園文錄外編》（上海：上海書店，2002年），頁245。

<sup>31</sup> Henry D. Smith II, "Tokyo as an Idea: An Exploration of Japanese Urban Thought until 1945," *Journal of Japanese Studies* 4, no. 1 (Winter 1978), pp. 56-57.

<sup>32</sup> 余懷（1616-1696），字澹心，又字無懷，號廣霞、曼翁，又號壹山外史、寒鐵道人，晚年自號鬢持老人。祖籍福建莆田。明清之際遭逢鼎革之變，不願仕宦二主。晚年退隱吳門，漫遊支〔下轉頁286〕

文學圈縈繞不去的文化符徵，<sup>33</sup>但筆者更希望從王韜與成島柳北冶遊文本中的城市書寫與史誌筆法為中心，分析其敘事托喻，重建十九世紀末葉上海與東京的文化氛圍，並從文化傳繹的諸種面相，挖掘《板橋雜記》作為指涉豐富的文化載體，如何呈現中日轉型期知識份子面對西潮東漸的世變衝擊之心態史異同。

《柳橋新誌》初編中，多處即以余曼翁《板橋雜記》為比較觀點，例如：

假母貪悭無厭，而真母否，以情故也。曼翁《板橋雜記》云：親母則取費不多，假母則勒索高價，人情無東西，可知矣。親母或併其衣服器物，亦送之至。義母則剝其皮裸而沽之。故真猶可愛而假可最惡也，況乎假者不知其誰氏女，乞兒之兒耶？抑王侯之種耶？贖之為妻妾，何等意思，傳云：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噫，彼徒果能卜之歟？

《板橋雜記》云：衣衫皆客為之措辦，巧樣新裁出於假母，衫之短長，袖之大小隨時變易，見者謂是時世粧。崇禎距今過二百年，地之相去數萬里，而風情酷肖，可謂奇矣。而近時服飾之美，月加歲長，至今春殊甚，大妓之飾，迴出命婦孺人之上，小妓亦僭擬大妓，頭上簪釵玳瑁燦然，至大妓更插玳瑁長筓。<sup>34</sup>

這些段落清楚可見自十八世紀前半期舶載入日<sup>35</sup>的《板橋雜記》在日本漢文學，特別是世襲擔任德川幕府侍讀（如清代之翰林學士）的柳北其人其文的影響印痕。柳北身處幕末與維新期的易代之際，面對明治開化期間社會上的種種可笑可歎之事，不免以諧謔筆法加以批判，新政後任幕府舊業者喪失官職與身份定位的認同危機，更與曾遭逢明清鼎革之變的余懷在作品中流露出的遺民意識若符合節。因此，他欲以記

---

〔上接頁285〕

劓、靈岩之間，徵歌選曲，不再過問世事。與杜濬、白夢鼐齊名，生平交往人物多為當世名人，如王士禛、尤侗、李漁等人。著有《板橋雜記》、《余子說史》、《硯林》、《茶史補》、《味外軒零拾》、《四蓮華齊親錄》、《研山堂集》、《秋雪詞》、《宮闈小名後錄》、《三吳遊覽志》、《婦人鞋襪考》等。參見《余懷集》（揚州：廣陵書社，2005年），〈余懷及其著述〉，頁1-21。

<sup>33</sup> 見李進益：〈明清小說對日本漢文小說影響之研究〉，頁166-85；鄭清茂：〈海內文章落布衣——談日本江戶時代的文人〉，《東華人文學報》第1期（1999年），頁30；高文漢：〈孤忠鑄詩魂，綺語綴華章——評日本近代漢文學家成島柳北〉，《日語學習與研究》2006年第1期，頁70；大木康（著）、辛如意（譯）：《風月秦淮：中國遊里空間》（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7年），頁22-25；孫虎堂：〈略論成島柳北及其漢文小說《柳橋新誌》〉，頁191-93。

<sup>34</sup> 《柳橋新誌》初編，頁十七下至十八上、二二上至二二下。

<sup>35</sup> 見大庭脩：《舶載書目》（吹田：関西大学東西學術研究所，1972年），上冊，頁7；李進益：〈明清小說對日本漢文小說影響之研究〉，頁18-21；孫虎堂：〈略論成島柳北及其漢文小說《柳橋新誌》〉，頁190。

金陵名妓列傳筆法徵柳橋一地之繁華，便難免屢屢發出諷刺現實、今不如昔之歎：「余曼翁列金陵珠市名妓作其小傳，佳人之跡百世不朽，余今欲記柳橋紅裙以準擬之而未詳，有一個行實可記者，乃徒列所聞之名十之七八于左而已，後之情痴如余者，若索其事作其傳，以繼曼翁之舉，則有一以使脂粉色長不朽，一以可徵斯地繁華於後日者矣。」<sup>36</sup>

在這樣的中日、古今視野對照之下，柳北不禁對柳橋的糜爛風氣發出批判：「金陵名妓李十娘語余澹心言曰：『兒雖風塵賤質，非好淫蕩者流，如夏姬河間婦也。苟兒心所好，雖相莊如賓，情與之洽也。非兒心之所好，雖勉同枕席，不與之合也。』噫，柳橋之妓夥矣，若深求則無一人彷彿十娘者乎哉！」<sup>37</sup>此段引述《板橋雜記·麗品》中首位記述的名妓李十娘與余懷的著名對話，呈現了風塵中人潔身自好、品位自高的風度，卻無疑更在指涉當下時空（東京柳橋）文化價值的淪落。這當中，明季秦淮名妓的風骨以及鼎革之際名士佳人的節烈事蹟，亦屢屢出現於文本中：

夫花柳之遊，其來也久矣，故名妓艷姬之跡，與英將忠士同傳千載者，無慮數百名，非有多情人記而存之耶？蘓小小之心與西陵松柏表貞，毛惜惜之節與淮海波瀾爭清。綠珠於崇，不負其恩；紅拂於靖，真知所奔。楚蓮香坐臥也，蜂蝶慕其香風；高玲瓏唱詩也，其音定玲瓏。顧媚之迷樓，巧迷了詞客；薛濤之彩牋，能呈彩于書閣。如葛蕊芳之烈操，李湘真之雅致，則全然不似女子也。我邦往昔所謂白拍子者，<sup>38</sup>亦妓也。若千手鼓琶，慰重衡於羈館；靜女奏舞，不屈賴朝於幕府。皆是千古之情事，百世之雅談，使聞者恍然惘然，神飛魂颺，而涎其美泣其情者。世濟人齷風致如是者，今也則亡。<sup>39</sup>

柳北所謂「千手」、「靜女」，乃為平安、鎌倉時代將軍武士平重衡與源義經的情人與愛妾，以擅歌舞著稱。她們雖是伎人樂戶出身，卻不畏強權惡勢壓迫，展現不屈的膽識與勇氣，<sup>40</sup>與秦淮佳麗葛嫩、<sup>41</sup>李十娘的貞烈形象互相輝映，見證一代風華。然而，對照「世濟人齷」的當下時空，夙昔典範已遠，傳統文化核心價值亦隨之殞落。

<sup>36</sup> 《柳橋新誌》初編，頁二五上。

<sup>37</sup> 同上注，頁二四上。

<sup>38</sup> 白拍子為平安末期至鎌倉時代，一種女扮男裝的女藝人。她們的特徵為口中吟唱著今樣（流行歌曲），手裏拍打個著笏，雙腳則隨著旋律踩著拍子，遂稱白拍子。

<sup>39</sup> 《柳橋新誌》初編，頁二七下至二八上。

<sup>40</sup> 參見日野龍夫（校注）：《柳橋新誌》（東京：岩波書店，1989年；與《江戶繁昌記》同本），頁376，注釋4、5。

<sup>41</sup> 葛嫩本為將門之後，其父因抗清殉國，家破人亡，葛嫩淪落秦淮，指奸辨賢，抱香自重。孫臨為葛嫩娘贖身，娶為側室。清初孫臨參加抗清活動，唐王時任監軍副使。一日過太湖，孫臨因事登岸，將葛嫩娘留在舟中，忽有清兵至，舟上明軍力戰死。清兵見葛嫩娘貌甚美，欲逞獸慾，葛嫩娘咬舌自盡，鮮血噴向清軍，跳湖殉難死。

陋妓拙孃售技方息，而至情之事可以適也。風凍霰濺之夜，綺樓有春，情夢正暖，酒氣常薰，不知二州橋上月影凍殺人。余疑孫臨<sup>42</sup>定情之歡，韓香<sup>43</sup>謝客之親，必在斯辰也。天明矣，屋瓦皚然，於是乎注酒於瓶，安爐于船，以為墨堤觀雪之遊，豈有興盡而還乎？至若年華將除，人情匆忙之際，迺別開分歲之宴，豫締春遊之契，吁亦快矣！余忖度千古才子佳人之心，想像往昔甘心得意之遊，豈得與此間有霄壤之異耶？夫風花雲月之變態，絲竹肉之妙趣，一悲一歡一顰一笑之綢繆，可以詩也，可以畫也；雖然，亦焉可與彼蚩蚩齷齪，徒揮其財而炫豪，不問其趣，唯美是涎者語此等之事乎哉？<sup>44</sup>

今日妓女多數為「陋妓拙孃」，顧客皆是「蚩蚩齷齪」，只知「揮其財而炫豪，不問其趣，唯美是涎者」，更加突顯其與往昔才子佳人事蹟與風流形象「有霄壤之異」；另外，幕府瓦解後，在維新政府官吏的撐腰下，柳橋繁盛固然無以復加，但卻流於惡俗，柳北便從具備技藝才識的妓女之日漸鮮少談起：

柳橋往日之妓，無姿色則有技藝，無技藝則有才識，三者無一而與婢子同致者，甚希矣。今則否，無姿色無藝無才徒粉其面錦其身而是妓之稱者，十之七八，不啻有眼之客鄙而遠之，雖僮父痴漢亦或疑其妓而不妓，故揭名月餘未蒙一招者，往往有焉。故雖妓籍日殖，而不使各樓能倍其利也。蓋頃年商賈罷弊，閭巷失產者無數，皆百計求活，故女兒鼻目稍具而彈得宵待、曉怨一曲者，爭入妓籍，是妓而不妓者日殖之原也。夫無姿無藝者自知無由于獲客，故濫轉巧術，唯利之視，其風一播，雖中等以上頗有名聲者，亦漸染其習，噫！柳橋聲妓之風一壞，而其醜不可言也。然則柳橋雖加其盛於往日，而其實可謂大衰者歟，抑客亦有罪焉？不知遊戲有其道，不辨風流為何物，沉湎耽溺不問其為妓與不妓，喜濫轉以為戀己，信巧術以為愛己者甚多，偶有淑良而不輕浮，能存柳橋往時之遺風者，則皆罵以為痴頑不解事之老婆。夫客而如此，則安能得遇奴輩之日趨淫風乎哉？<sup>45</sup>

「妓而不妓者日殖」是因為維新政權取代幕府後，社會動盪，百業凋敝，淪落煙花的商人女子不少，「濫轉巧術，唯利之視」，直接衝擊「聲妓」（具曲藝素養的高級妓女）的行情，使得青樓規制崩潰。因此柳橋雖繁盛，風氣之敗壞也埋下了衰頹的先兆。身為明治新朝新貴的妓家嬌客沉溺於酒色文化，不辨妓女的才藝識見，更間接指陳

<sup>42</sup> 即為《板橋雜記》所載名妓葛嫩與孫克咸（名臨）定情之事，參見上注。

<sup>43</sup> 韓香，南徐之娼也，色藝冠一時。與大將葉氏子交，閉門謝客，將終身焉。見馮夢龍：《情史》（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3年），頁30。

<sup>44</sup> 《柳橋新誌》初編，頁二九下至三十上。

<sup>45</sup> 《柳橋新誌》二編，頁三上至四上。

幕府崩潰後，維新政權一味追求西潮西學皮毛，拋棄江戶傳統文化遺產，致使淳良風俗幾近淪亡之文化危機。成島柳北署名何有仙史，於1877年創辦的詩文雜誌《花月新誌》第1號上刊出〈《柳橋新誌》三編序〉，就指出從1859年至1876年間，柳橋一地的興盛已歷經大起大落：

余之始著《柳橋新誌》也，年二十有三，當幕朝未喪其師之時，而柳橋之繁華大有可觀焉。及著第二編，則皇室定鼎於東京，百事維新，余齡三旬加四，而當時柳橋，綺羅競妍，絲竹鬪嬌，其氣焰殆如添幾度熾熱，而其實有胎衰兆於其間者。爾來倏忽七裘葛，全都光景，轉變可驚，而余亦衰矣。……頃日島原淺草私窩鬻毒，遂招黑夜白梃之禍，餘威施及花柳場裡，驚蝶夢於香房，割鴛衾乎水樓之變，比比現出新聞紙上，而柳橋最居多云。其冷索寂寞，使脂粉之氣全然凋萎者，亦不足異焉。浮屠氏所謂色即是空，安之非為柳橋今日之事而道也。噫！東京第一風流之地，而業已如是，其他可推知也。<sup>46</sup>

文中柳北以自身從青春到壯年來比附柳橋的繁華與凋萎，細數「幕朝未喪其師」至「皇室定鼎於東京，百事維新」的政治變遷左右了柳橋的發展，新政權更加助長柳橋氣焰，雖商業畸型繁茂，卻也招來「私窩鬻毒，遂招黑夜白梃之禍」，波及柳橋青樓。負面消息屢屢在新聞紙上刊出，柳橋便迅速地衰敗蕭索。這些段落與其說是記述柳橋一地興衰，不如說是映現十九世紀東京城的變遷縮影，隱藏在字裏行間「眼看他高樓起，眼看他樓塌了」的意象，其間寄寓的砭針世風及對新政之批判意味，不言可喻。

饒具意義的是，與柳北《柳橋新誌》描述的時空約同期，上海文壇的晚明回歸熱亦蔚然成風。十九世紀七十至八十年代，上海文壇《板橋雜記》的仿作不少，亦復將它作為今昔文化對照的座標。如前面所述王韜一系列冶遊錄仿效的前行典範：秦淮歌妓、吳門名娃與高士碩彥的風流事蹟，擴大來看，不僅為晚清上海文人追摹慕想的典範，更成為此類風月書中不斷模擬複製的文化符碼。

《海陬冶遊附錄》中王韜提到他撰寫此書的動機：「滬上青樓多在北里，庚辛以來，倍極繁華。壬戌〔1862〕之秋，余浮海至粵，自此遂與隔絕。其中素飲香名，夙推豔質，以翹舉於花國，而領袖羣芳者，惟有得之耳聞而已。且前後風景迥殊，規模亦稍異，不獨倍盛於曩時為不同也。僕三生杜牧，綺夢全消，十載揚州，狂名尚在。問前度之劉郎，桃花如舊；作重來之崔護，人面難尋。聊述所知，以供臥游。」<sup>47</sup> 這段話除了身在香港的王韜遺憾不能見證申江北里繁華之「在場者」外，就像學者指

<sup>46</sup> 〈《柳橋新誌》三編序〉，《花月新志》第一號，頁九下至十上；亦收入成島柳北（著）、青柳達雄（解說）：《柳橋新誌》（東京：勉誠社，1985年；與《伊都滿底草》同本），頁143-44。

<sup>47</sup> 收入《豔史叢鈔》，下冊，頁601-2。

出的，與晚明模式做為「對比」來批判上海的青樓文化是王韜最為擅長的筆法。<sup>48</sup>如〈眉繡二校書合傳〉中描繪眉君，強調她「雖處勾欄，選擇殊苛，有不當意者，雖出重賞，弗肯流盼」，與《板橋雜記》中的顧媚傳記相當神似；傳記中另一個妓女李繡金，「每見文人才士，極相憐愛，周旋酬應，出自至誠，從不瑣瑣較錢幣。若遇巨腹賈，則必破其慳囊而後已」，<sup>49</sup>與寓居上海的名士李士棻（字芋仙，1821–1883）交情匪淺。

從橫剖面來考察，王氏筆法一時間也紛紛出現在同時期由上海文人編著的「花榜」類書中。1879年由花下解人撰輯的《吳門百豔圖》（1880年出版，1884年、1887年改名《上海品豔百花圖》再版），就是另一部寓滬的江南文人企圖重現晚明秦淮文化遺緒的代表作。作者花下解人疑為蘇州文人俞達，<sup>50</sup>其長篇妓女小說《青樓夢》1878年在上海出版，正與1879年出版的《吳門百豔圖》<sup>51</sup>前後銜接。《吳門百豔圖》雖以記述出身南京、琴川、揚州等地的蘇州名妓為主，但也提到一部份妓女「遷居滬上」，重張豔幟。因此，我們在稍晚出現的同類書不難重遇其身影，如畢以堦《海上群芳譜》中的妓女周文卿、姚倩卿、周小翠、姚婉卿、李迎子、郁憶芝、朱墨卿、周斐卿等人事蹟皆曾載於《吳門百豔圖》中；鄒弢所撰的《春江花史》中，姚倩卿、汪韻梧、朱墨卿、高雯卿等，亦曾名列《百豔圖》。

另外，鄒弢此書與畢以堦《海上群芳譜》亦經常提及某姬「事詳《海陬冶遊錄》」，<sup>52</sup>可見俞達與王韜的花史及冶遊書皆經常被後繼者引用，側面托出當時幾位特定的妓女是這群文人經常顧訪的對象，幫助我們重構這些滬上文人的生活面相。從另一角度分析，青樓妓女的流動與遷徙，正說明了上海已成為新興的經濟重鎮。滬上儘管銅臭熏人，但它迅速地取代了江南（包括江北的揚州）文化古城，成為吸引各方面移民的「海東利藪」，已是不爭的事實。故從滬上冶遊文學的系譜綜合看來，十九世紀

<sup>48</sup> Catherine Yeh, "Creating a Shanghai Identity: Late Qing Courtesan Handbooks and the Formation of the New Citizen," in *Unity and Diversity: Local Cultures and Identities in China*, ed. Tao Tao Liu and David Faure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96), p. 110.

<sup>49</sup> 《淞隱漫錄》，頁70、71。

<sup>50</sup> 俞達(?–1884)，一名宗駿，字吟香，號慕真山人，江蘇長洲人。終生仕途失意，中年頗作冶游，以坐館為生。生前與鄒弢為至交，俞過世後，鄒成詩五十首以哭之。除《青樓夢》外，尚有《醉紅軒筆話》、《花間棒》、《吳中考古錄》和《閑鷗集》等著述。見鄒弢：《三借廬筆談》（臺北：新興書局，1988年），卷四，頁二下至三上。

<sup>51</sup> 此書題為「花下解人寫豔」，有光緒五年（1879）三借廬主人（鄒弢）的長序，序言中透露他當時人在「虞山客寓」（虞山位於常熟），證諸第一篇亦是箇中人的序，也提到當時花下解人有「自娛軒詩稿」，當時他亦作客虞山，因此請同在虞山客次的好友鄒弢評定甲乙，且更改原先「百花榜」為「百豔圖」，據此可推測花下解人即為《青樓夢》的作者俞達。參見邵雍：《中國近代妓女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頁87。

<sup>52</sup> 如《春江花史》陳玉卿、朱逸卿、胡寶玉一條。《海上群芳譜》中姚芳葆一條，引出淞北玉鮓生（即王韜）的贈詩強調她的「解音律，知翰墨」，見畢以堦（小藍田懺情侍者）：《海上群芳譜》（上海：申報館，1884年），卷三，頁二上。

七十年代末出現在上海的《吳門百豔圖》雖與王韜《海陬冶遊錄》一系列書的風格相輝映，亦可上推余懷筆下的才士名娃傳奇，但該書於八十年代由刊行人王氏改名為《上海品豔百花圖》再版，<sup>53</sup>更可視為「上海豔書」之一脈。它首開以「圖像」為名，擇其尤者繪圖十幅，配以短詩歌詠，亦不啻為滬上冶遊圖文書的先例。

從出版資料考察，八年後出現的專以妓女繪像的「插畫書」，如掄花館主人的《鏡影簫聲初集》(1887)、前文已經提過的《淞濱花影》、《海上青樓圖記》，都突出「影像」視覺成分，無疑可視之為繼《百豔圖》的踵事增華之作。是故從《吳門百豔圖》到《上海品豔百花圖》，應視之為「上海豔書」從秦淮過渡到申浦的一個典型例證，冶遊文學的海上風格逐漸清晰。如果我們再將它與後來的《春江花史》與《海上群芳譜》等書做一比對，就會發現其中不少饒富意義的落差與雷同，不僅將使此文類的內在矛盾凸顯出來，更進一步揭露作者的「悖論式」的自我質疑與自我邊緣化的傾向。

如《春江花史》中，經常有「滬上妓女大都來自吳門，間有土著及雲間產，率皆染海濱粗俗之氣」的描述，<sup>54</sup>指出時人對上海妓女的評比委實以蘇幫居冠。換言之，「來自吳門」彷彿成為品質的保證，色藝俱佳與蘇州古城悠久的文化底蘊，在此相互指涉界定。此外，《板橋雜記·麗品》中所載諸姬及明季名士佳人的事蹟，也是文本中另一個評量指標，如《春江花史》中將袁雲仙比之孔尚任《桃花扇》中擅長崑腔評話的「蘇柳」諸人，<sup>55</sup>將朱蕊卿比之李十娘，<sup>56</sup>以「豪爽如馬湘蘭」來形容王凝之；<sup>57</sup>《海上群芳譜》裏亦將來自蘇州的妓女黃銀寶比之李十娘，李佩蘭善琵琶幾乎讓人有「江南重見李香君」之感，黃繡君識人之才直追李香君，<sup>58</sup>蘇州來的李二寶被譽為「香君風格自清幽」，<sup>59</sup>潘繡寶精七絃琴「卞玉京不能專美於前」。另外，畢以堦亦經常提到癸未(1883)秋季柵湖漁郎曾評定的花榜「春申二十四鬢」，榜上有名的申江妓女，也幾乎全數以余懷筆下色藝俱絕的秦淮佳麗為喻，如吳蕙香(沙才兒)、周小紅(顧眉

<sup>53</sup> 見上海通社(編):《舊上海史料匯編》(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8年),頁584。

<sup>54</sup> 《春江花史》,利卷,頁十二下。

<sup>55</sup> 指柳敬亭、蘇崑生。蘇崑生原名周松如,曲藝奇高,曾在闖黨餘孽、魏忠賢乾兒子阮大鍼府中當音樂教習。後恨阮大鍼殘害忠良,不顧重薪,拂袖而去。秦淮名妓李香君曾從蘇崑生習藝。《春江花史》載:「袁雲仙,本琅琊後裔,……通文墨,喜崑腔,尤精於評話,登場說法,舌辨風生,桃花扇中蘇柳諸人,當亦許其追步。」見《春江花史》,利卷,頁二四下。

<sup>56</sup> 文中提及,朱蕊卿年十二便以善歌著名,「壬午秋,余秋風戰敗,小駐申江。一夕獨步西公里,經香巢下,聽唱〈滿江紅〉一闕。時天街人靜,萬籟無聲,而月色如銀,不啻李三郎身在廣寒聽奏霓裳三疊也」。見《春江花史》,貞卷,頁二十上。

<sup>57</sup> 文中提到王凝之陽關一曲,若嬌鶯啞啞,清脆如瀉瓶裂竹,《申報》主筆之一夢畹生(黃式權)謂其「豪爽如馬湘蘭,宛轉如凝香兒,洵不誣也」。見《春江花史》,貞卷,頁三十下。

<sup>58</sup> 文中提到《申報》筆政霧裏看花客(錢昕伯)、倉山舊主(袁祖志)嘗賞識之,漢上漁隱曾云:「慧眼能將名士識,此君應可繼香君。」見《海上群芳譜》,卷四,頁一上。

<sup>59</sup> 《海上群芳譜》,卷二,頁十上。

生)、顧蘭蓀(馬嬌)、李鳳寶(董年)、殷墨蘭(頓小文)、朱素貞(葛嫩)、周麗卿(王小大)、胡秀林(崔科)等等,皆說明了《板橋雜記》奠定的審美與品位之基準,雖歷數百年,其影響力猶未衰減,成為此滬地文人歷史回眸的特定時空,並於品花評月的文本中熠熠生光。

這也間接解釋王韜的《海陬冶遊錄》一系列書之中,為何屢屢強調某名妓為吳門宦臣之女,某名妓來自橫塘、白門、金陵、姑蘇等等舊日文化重鎮或古都名郡,<sup>60</sup>其居處「簾櫳峭靜,室宇精潔」,<sup>61</sup>高級妓院「院宇深沉,樓閣高迥,層檻迴廊,宛如世族」,<sup>62</sup>並在字裏行間流露出對於上海城當年(嘉慶、道光年間)「名流踵至,提唱風雅」<sup>63</sup>的追念與緬懷。我們可以從文本脈絡歸納出:名妓色藝精絕與否猶在其次,「性愛文人才士」或「苟遇大腹賈,即以閉門羹待之」<sup>64</sup>的妓女,才是王韜眼中超凡絕俗豔冠群倫的佳人。

其次,此類文本的筆法模式便是在上海的妓女與青樓院落中重構曾經存在的夙昔典型與文化記憶,王韜強調《海陬冶遊錄》一書是循余曼翁《板橋雜記》之例來記載上海妓女軼事,並以此標準將申江名妓分隸品級高下。<sup>65</sup>只是明眼的讀者會發現,體例相仿只是表象,《板橋雜記》充滿亡國之痛,哀悼文化價值沉淪失落,才是王韜在冶遊錄中所寄託的醉翁之意。

誠如研究者所指出的,洋場風華正茂,妓業的興盛更不在話下,現實狀況似乎與王韜文中影射朝代歿亡的傷感情調與立場並不相符。<sup>66</sup>但是,也就因為這層排比的落差,更加揭露了這批都市中的洋場才子擺脫不了的士大夫姿態:在傳統士人眼中道德淪喪的現代化潮流與商業文明的大軍壓境,可堪與明清之際朝代鼎革的巨變互為隱喻,並勾動洋場文人對時下功利膚淺的文化風尚之憂心批判。

因此,自命「風月平章」<sup>67</sup>(意即青樓宰相)的王韜,頻頻感嘆江南妓女一到了上海便渾身銅臭俗氣。在他眼中,青樓除了是徵歌選色的所在,也是一扇窺看文化風氣與時代潮流浮沉變換的窗口:「顧或謂昔趙秋谷《海滬小譜》、余曼翁《板橋雜記》、

<sup>60</sup> 太平軍相繼攻陷南京、蘇州,在戰亂中逃到上海淪落為娼的江南巨族世家女子不在少數。從《白門衰柳記》看來,許多名妓舊籍蘇州,及當時人稱「娼妓大半來自吳門」,佔了租界區娼妓人口的一大部份。見忻平:《從上海發現歷史:現代化進程中的上海人及其社會生活(1927-1937)》(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頁40-41。

<sup>61</sup> 《海陬冶遊錄》,卷中,頁四下;收入《豔史叢鈔》,下冊,頁564。

<sup>62</sup> 《海陬冶遊錄》,卷上,頁五上;收入《豔史叢鈔》,下冊,頁549。

<sup>63</sup> 《海陬冶遊錄》,卷中,頁一上;收入《豔史叢鈔》,下冊,頁557。

<sup>64</sup> 《海陬冶遊餘錄》,頁七下;收入《豔史叢鈔》,下冊,頁754。

<sup>65</sup> 〈《海陬冶遊錄》自序〉,頁一上;收入《豔史叢鈔》,下冊,頁535。

<sup>66</sup> 葉凱蒂:〈文化記憶的負擔:晚清上海文人對晚明理想的建構〉,載陳平原、王德威、商偉(編):《晚明與晚清:歷史傳承與文化創新》(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頁58。

<sup>67</sup> 王韜:〈眉繡二校書合傳〉,載《淞隱漫錄》,卷二,頁十六上。



西溪山人之《吳門畫舫錄》，皆地當通都，時逢饒樂，其事可傳，其人足重。今一城斗大，四海氛多，既無趙李名倡，又少崔張俠客。染黛研朱，藥叉變相，墜鞭投轄，猾虜爭豪。未聞金屋之麗人，能擅玉臺之新詠。矧又不能抽白刃以殺賊，取諡貞姬，著黃絕而參禪，證名仙籍。綺羅因之減色，脂夜於焉為妖。」<sup>68</sup>文中將幾部描繪前朝江南風月的典範著作拿來做一比對，要凸顯的就是強烈的今不如昔之感。不僅晚明名妓的高尚情操與不屈氣節，在上海洋場妓家中已然蕩然無存，與成島柳北有同樣慨歎的是，就連伎人傳統所強調的才華技藝，在海上名花中也寥寥可數，乏善可陳。乍看之下，謔稱自己「丐食滬上」<sup>69</sup>的王韜對阮囊羞澀、無法與富賈巨賈抗衡似乎不以為意，但他慨嘆妓女粉頭「綺羅因之減色，脂夜於焉為妖」的語調，卻隱隱流露了洋場文人面對強勢的商業文明以及士大夫文化地位逐漸淪喪所產生的自憐心態。

在這種凸顯今不如古的差異與純粹美化晚明模式的雙向往逆中，同治、光緒時期取代上海縣城內舊有妓院而成為申江風月翹楚的滬北租界區妓院，自然顯得失色許多。王韜寫道：

滬城少水，無畫船簫鼓諸勝。春秋佳日，士女出游，多萃於西園。園有茶寮十餘所，蓮子碧螺，芬芳欲醉，時來麗人，雜坐成羣。每當夕陽將落，人影散亂，真覺衣香不遠，輕薄少年，鄉曲獍子，掉臂其間，多與目成而去。<sup>70</sup>

黃式權的《淞南夢影錄》也有相同的描述：

滬城無畫船水榭之勝，青樓妙選，多麋曲里巷中。如東西繪芳里、東西公和里、合興里、合信里、繪芳樓、小桃源、毓秀里等處，樓深巷狹，曲折迴旋。每當夕陽欲下，羅綺風柔，管絃聲沸，脂香粉膩，如水如雲。遊客至此，真有迷路出花難之勢。至東西棋盤街、兆榮里、肇貴里、百花里、公順里、桂馨里諸處，昔之稱煙花窟者，近來俱次等句欄，而走馬王孫，揮金大賈，無復歌墜鞭入院者矣。<sup>71</sup>

王、黃兩人同屬於報人圈子，皆對「滬城少水」或「無畫船水榭之勝」同表嗟嘆，該有最早的報導文學意味。可見在文人眼中，當時租界區設在馬路邊里弄街坊之間的「長三書寓」、「么二堂子」，一開始就缺乏水湄畫舫的妓家「迴非塵境」的空間條件。作者一再強調妓家布局在滾滾紅塵之中，主要還在凸顯妓院的驕客不復為名流士紳或才子文人，而被狎客商賈所取代（但卻不具往昔「揮金大賈」的堂皇氣勢）。租界區的妓

<sup>68</sup> 〈《海陬冶遊錄》自序〉，頁一上至一下；收入《豔史叢鈔》，下冊，頁535。

<sup>69</sup> 《海陬冶遊錄》，卷中，頁二下；收入《豔史叢鈔》，下冊，頁560。

<sup>70</sup> 《海陬冶遊錄》，卷上，頁三上；收入《豔史叢鈔》，下冊，頁545。

<sup>71</sup> 黃式權：《淞南夢影錄》（臺北：新興書局，1980年），卷四，頁七上。

家既乏秦淮河畔的波光灩澦，亦非等待問津客尋訪的深深庭院。高級妓院的紅牌倖人更經常在半私人半公共性質的花園露臉，與「輕薄少年，鄉曲獃子」公然勾搭。反過來說，書中所述寥寥可數饒有古風的妓女，益發映現出：整體而言，海上名花早已不復見晚明名妓的絕代風華，而妓女「花遭溷墮，蓮逐泥污」<sup>72</sup>的命運，更與晚清文人心中琉璃般晶瑩剔透的才子文化、名士傳統之淪亡互為指涉，成為洋場才子所遭逢的歷史文化難題之具體象徵。

故從十九世紀末葉中日文化圈的橫剖面來看，與其說這些花史與風月誌中的「她者」書寫是傳承並延續前人的品鑑美學，不如說此類敘事文本乃是文人社群經由口語言說與虛實參半的經驗而不斷複製出來的文化產物。它們以哀悼某個中心價值的衰敗為敘事特徵，在凸顯憶想、夢語、臥遊之心影的同時，更披露了創作主體對庸俗現實的批判及面對新興潮流的焦慮。這些文本亦可以歸納出一個同構相類的敘事模式：首先刻畫某妹在人品與才華上獨標眾類的特質，吟詠讚嘆之餘，也帶出對銅臭薰人<sup>73</sup>的上海洋場現實環境，或如暴發戶般的新進仕族不解日本江戶文化遺風之慨嘆，最終目的是對顯士大夫文化與優美傳統在庸俗潮流被擠壓為弱勢邊緣，文化主體性與核心價值橫遭斷傷而成劫後餘灰的時代語境。

換句話說，該類文體的敘事特徵固然採取余懷面對清兵入關的家國巨變後，自命前朝遺老，慨歎「河山邈矣，能不悲哉」<sup>74</sup>的筆調，卻更在藉由物/我關係、「她我」的書寫憑弔文化價值僅存剩水殘山，說明了此類文本觸及現代性主體建構之複雜過程。文本之再現對象與創作主體間的映照關係，亦進一步展示了近代中日文人面對西潮與文化轉型期社會徵狀的心態繹變痕跡。

### 文明進化的危機與契機

前兩節的分析說明，不管是洋場的興盛還是東京柳橋的繁華，一方面帶給當時文人與轉型期知識份子複雜矛盾的不安體認，但本節也將進一步闡釋，新興潮流的沖刷撞擊，另一方面卻也帶來不可預期的文化轉型契機，蘊藏著從嶄新視角審顧舊有傳統並開創新境的潛力，加深了是類風月書所含納的豐富與歧義性。如上文提及的，王韜與成島柳北各別在近代中日報刊史上地位重要。巧合的是，王韜在香港創辦《循環日報》，成島柳北擔任《朝野新聞》社社長，都是在1874年。成島柳北更在明治十年（1877）創刊《花月新誌》詩文雜誌，連載漢文與和文的詩歌文章，發行至1884年，總計刊載一百五十五號。

<sup>72</sup> 同上注，卷一，頁六上。

<sup>73</sup> 《春江燈市錄（海上花天酒地傳）》，亨卷，頁九下。

<sup>74</sup> 見余懷（著）、桑孝寬（句讀）、山崎蘭齋（譯）、齋田作樂（解說）：《板橋雜記：唐土名妓傳》（東京：太平書屋，1997年），卷下〈軼事〉，頁107。

王韜1879年的東瀛之行，基於報人的自覺，除了冶遊書之外，也注意到成島柳北在報刊界的標誌性地位。他與栗本鋤雲、福地源一郎<sup>75</sup>鼎足而三，堪稱日本近代重量級的早期報人：「鋤雲老而不仕，……維新既建，日報盛行，時始創『報知社』，聘君司編輯事，然非君初志也。後福地源一郎、成島柳北各建一社，與君鼎足而三。」<sup>76</sup>此外，王韜與成島柳北身為上海（、香港）和東京報刊界大老，兩人又分別在1868年與1872年啟程遊歷歐美，<sup>77</sup>對泰西物質文明，特別是新聞報刊界與出版業的觀察與了解，亦影響了他們的風月誌與冶遊書寫。如前一節所云，在此類文本中，作者一方面在描繪城市繁華與慾望時自我邊緣化，展現出尋索新身份定位的焦慮，一方面卻因掌握現代化報刊並左右社會輿論與發言權，對新興的市民文化影響匪淺，因而不免有自我揄揚的得意之情。考察中日城市文藝圈與文人群體，往往發現這兩股互斥而相逆的力道交織共生在十九世紀末葉的城市冶遊文學中。

前面提過，成島柳北創辦詩文雜誌《花月新誌》與朝野新聞社，<sup>78</sup>在維新時期的東京市民文化中佔有一席之地，當時主要的文人與漢學家如菊池三溪、小野湖山、大沼枕山、大槻盤溪、依田學海、森春濤等都有不少詩文作品刊登在《花月新誌》上。翻閱《花月新誌》，就會發現幾乎每一期都有品評妓女的主題詩文（多以漢文寫成），或創辦人柳北所撰與文友的詩文，乃至於讀者步韻和詩投稿。該雜誌創刊號上還刊登《柳橋新誌》三編<sup>79</sup>的序言，預告柳北即將再度出版東京遊里風月誌的消息，種種訊息都說明了《花月新誌》擺蕩在高雅文化與市民文化間的雙重特徵。

<sup>75</sup> 福地源一郎於慶應四年（1868）閏四月在江戶發行了有佐幕傾向的《江湖新聞》，由於闖下筆禍而一時被監禁，到五月的二十二日即停刊。

<sup>76</sup> 《扶桑遊記》，卷中，頁一上至一下。除了這三位日本早期重量級的報人外，值得注意的是，日本最早發行的新聞報紙之一《東京日日新聞》（1872年創刊）的創辦人、著名實業家岸田吟香（1833-1905）在1868至1888年往返中日之間，與上海文藝圈關係匪淺。他曾協助一直想渡日賣文的海派文人與書畫家陳曼壽（?-1884），寫信向《朝野新聞》主筆成島柳北推薦，使陳在1880年可以順利東渡日本。見〈上海ノ岸田吟香翁ヨリ柳北ヘ贈リシ書簡〉，《朝野新聞》（明治十三年四月十三日）；轉引自賴毓芝：〈伏流潛借〉，頁180-82；另參見陳祖恩：《尋訪東洋人：近代上海的日本居留民（1868-1945）》（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7年），頁59-70。

<sup>77</sup> 成島柳北在幕府瓦解後，自稱為「天地間無用之人」，隱居於向島，編《柳橋新誌》第二編，藉由柳橋的改變來諷刺時世。明治五年（1872），隨東本願寺法主大谷光瑩前往訪問歐美，為期一年餘，留下遊記《航西日乘》與詩集《航西雜詩》等作品。

<sup>78</sup> 成島柳北擔任《朝野新聞》主筆時，便以敢於在雜文中批評當道者知名。1875年，因為不滿於新貴慫恿政府頒布《誹謗律》與《新聞條例》箝制輿論自由，在同年12月5日的《朝野新聞》上撰文點名批判法令起草者井上毅和尾崎三郎，因而以誹謗罪被判刑四個月，罰金百元。出獄後的柳北依然不改其耿直文風，文筆更加犀利，進入創作巔峰期。參見前田愛：《成島柳北》，頁447-59；另見高文漢：〈孤忠鑄詩魂，綺語綴華章〉，頁70。

<sup>79</sup> 《柳橋新誌》三編因為嚴厲批評時政，暴露官員愚行惡狀，受制於當時出版許可之限，最終並未面世刊行。見塩田良平（編）：《明治文学全集》第四卷（東京：筑摩書房，1969年），頁29-30、415-20。

柳北署名墨上漁史在《花月新誌》中多次連載《新柳情譜二篇》，每次皆刊出品評新橋與柳橋妓女各一人之長篇詠詩，詩末並有秋風道人評語。如《花月新誌》第八十九號中品評新橋妓女小光之詩末，秋風道人評曰：「漁史為校書下一評語，能使明眸皓齒，頓增聲價，不啻連城。」<sup>80</sup>新橋與柳橋一樣，皆以青樓風月區知名，校書雖為清末高級妓女之雅稱，在日本漢文化圈亦以此指色藝俱全的名妓。秋風道人這段評語側面襯托出成島柳北《柳橋新誌》與《花月新誌》等書籍與刊物的出版在東京文化圈造成的實質影響，甚且間接為青樓名姝的名聲與生意增值。如《花月新誌》第六十三號上登載憐花夢蝶生一組十四首詠妓詩，<sup>81</sup>就提到此組詩歌是步韻該刊登載的《新橋雜記》第二篇中南橋仙史〈十四詠〉。第八十九號中鶴亭小史刊出〈讀花月新誌成柳北仙史〉二首詩，開宗明義揄揚該刊：「美人才子大家評，詠月吟花筆底清。方是太平好時節，幾篇新誌補文明。」<sup>82</sup>詩中點出才子筆墨品評的美人（名妓）為東京城的維新開化氣象增添丰采。1871年出版的《柳橋新誌》二編中，記載：

壬戌之夏，余與柳春三<sup>83</sup>戲作〈柳橋二十四番花信〉，評阿金比梅花，阿幸比櫻花，阿久李花，小勝杏花，美代海棠，阿紺桃花，阿兼菊花，阿清牡丹，小繁拒霜，阿竹蓮花，菊壽紫薇，梅吉藤花，政吉燕子花，千吉芍藥，阿蓮水仙，小照躑躅，其他增吉、小糸、阿常、三代吉、阿輕、久吉、阿角、阿直亦各比眾芳，而當今存者唯阿幸、菊壽、政吉（今稱阿郁）、阿蓮四人耳。阿清、千吉、久吉三個既載艷名於鬼簿，餘皆四散，不知其所在者亦多。噫嘻，十年之久，一浮一沉，一枯一榮，豈獨紅裙而已也哉。<sup>84</sup>

讀者不難發現，〈柳橋二十四番花信〉榜上有名的妓女，亦經常出現在三年後創刊的《花月新誌》上，<sup>85</sup>足見柳北的妓女花品營造了文藝圈評艷的風氣，帶動市民娛樂文化的繁盛，更添柳北詩酒風流的形象。

<sup>80</sup> 見〈新柳情譜〉二篇（吟詠新橋小兼、柳橋阿久），秋風道人漫評。載《花月新誌》（明治十年一月創刊，東方：朝野新聞社內花月社）第八十九號（明治十二年一月十日發行），頁八下至九上。

<sup>81</sup> 這組詩分別吟詠了新橋妓女十二人：阿染、小松、小鶴、島次、國助、小萬、小仙、小竹、小園、小高、小時、三勝、小兼、小德，見《花月新誌》第六十三號（明治十二年一月十日發行），頁五上至七下。柳北在〈新柳情譜〉二編中也曾吟詠新橋妓女小兼，見《花月新誌》第八十九號（明治十二年一月十日發行），頁八下至九上。

<sup>82</sup> 見《花月新誌》第八十九號，頁六下。

<sup>83</sup> 即柳河春三。柳河春三為幕末維新時期著名的西洋學（蘭學）學者，他在戊辰戰爭進行當中的慶應四年（1868）二月於江戶發行了第一份由日本人自己編輯的日文報紙《中外新聞》。參見前田愛：《成島柳北》，頁436、441-42。

<sup>84</sup> 《柳橋新誌》二編，頁十四上至十四下。

<sup>85</sup> 其中以李花為喻的阿久，以及被評為菊花的梅吉分別在《花月新誌》第八十一號（吟詠新橋小兼、柳橋阿九，見頁九上至九下）與第八十九號（吟詠新橋小光、柳橋梅吉，見頁八下至  
〔下轉頁297〕

柳北與報刊界名士柳河春三戲作的〈柳橋二十四番花信〉，也讓人想起上海文壇與遊滬指南書關係密切的妓女花品、花榜或花譜。如上一節提到過畢以堦《海上群芳譜》中經常引述柵湖漁郎曾評定「春申二十四鬢花榜」，就與柳北的〈柳橋二十四番花信〉的名稱與命意相契。若將目光轉回十九世紀七十至八十年代滬地近二十種相關書籍仔細考查，我們也發現多數吟詠或評選者不是在報社（主要是《申報》）擔任主編筆政，就是與報人群體密切往來的文士，前者如何桂笙（鏡中花史）、錢昕伯（霧裏看花客）、蔡爾康（縷馨仙史）、鄒弢（號瀟湘館侍者、瘦鶴詞人），後者如二愛仙人李芋仙、免癡道人金繼、柵湖漁郎、癡情醉眼生等。

當時不少妓女經這些文人學士的品評、鼓吹後名聲大噪，其中王逸卿、李佩蘭、李三三、朱素貞、孫文玉、朱玉琴、陸月舫、姚蓉初、王雪香等都曾數次名列花榜。其中尤以名妓李三三最為典型，曾得到倉山舊主袁祖志的賞識，<sup>86</sup>作詩吹捧，結果引來騷壇文人紛紛效仿，竟然得「三三詞」六十餘首，名播士林。這些詩詞文本中呈現出的，彷彿如遠在香港卻隔海評價滬江青樓名姝的王韜所言：「滬上名姝其冠絕一時者，皆邀月旦之評，而登諸花榜，一經品題，聲價十倍，其不得列於榜中者，輒以為憾事。」<sup>87</sup>與前述經柳北題詩之妓將享譽同儕一樣，這裏所謂「一經品題，身價頓增十倍」也表示這些花品、花榜造成的接受效應相當巨大，憑藉報章媒體的宣傳，的確也為這些滬北名娃帶來可觀的收入。到十九世紀八十年代中葉擔任洋人報館《益報》筆政的鄒弢，就坦承他在撰寫《春江燈市錄（海上花天酒地傳）》、《春江花史》期間，不少妓女一聽說他將著此書，無不殷勤相待，再三請託他巧筆添花。此書完編即將付梓的消息傳出後，不少好友懇請其將相熟妓女的事蹟補入書中，唯恐喪失廁身其中的資格。文本中這些描述，說明具有代表性「花品」類書籍在出版市場炙手可熱。東京與上海的旅人以此類書刊做為冶遊門徑的權威，也揭示出此類書刊與通俗出版品和大眾媒體的密切關係。

另外，從柳北的報人身份與早年任職幕府將軍侍讀時即大量閱讀西學書籍的背景看來，《柳橋新誌》二編多處濃筆著墨並諷刺東京城接觸西潮後的文明景象，也就不足為奇了，如藉妓女對話評論當時交通工具人力車盛行的景象：

似輦而非輦，似轎而非轎，乘者仰而踞，推者俯而奔，鐵輪木轆輾輾作聲而來者，人力車也。一酒樓上數妓憑欄而觀，一妓顧左右曰：「陋哉車也。近來

〔上接頁296〕

九下)的〈新柳情譜〉二編上連載刊登。描述妓女小兼時，強調其「屋宇清楚，器具雅潔，而爺孃皆淳樸，不似市井之人也」（頁八下），乍看之下，頗類余懷描述李十娘「性嗜潔，能鼓琴清歌」，「所居曲房密室，帷帳尊彝，楚楚有致」的筆法（《板橋雜記》，頁36-37）。

<sup>86</sup> 自《申報》1882年1月14日（頁3）開始連綿數月，見《申報》合訂本卷33（上海：上海書店，1982-1987年），頁21671。

<sup>87</sup> 《海陬冶遊錄附錄》，卷中，頁一上；收入《豔史叢鈔》，下冊，頁633。

此車遍滿街衢，東輾西轟，咄咄怪事。往時遊客皆倩街輿，街輿之為物便而快，輿夫亦健捷，連叫鼓勇，其聲清亮，能使人遊意勃發，真是江戶兒之氣象，不似此車醜陋，殆與乞兒膝行車一轍也。方今客多捨輿而取車，論其價耳，何其鄙也。」老妓在側笑一笑曰：「卿妙齡，未知氣運之變。往年都內，觀侯伯之往來，謙從如雲，雙槍在前，鞍馬在後，張威競華。今則否，單騎奔馳，簡易為風，儉素是尚，卻是美事，聞官家頃日捨鉅萬金以造鐵路，將通蒸氣車，蒸氣車之疾，一瞬十里，一刻百里，如橫濱往還一飯時限耳，大坂長崎可一日而至，即漢土天竺亦可三日而達，真是所謂妙妙車也。」<sup>88</sup>

文中見多識廣的老妓口中的「蒸汽車」(即火車)的出現，透露了新的文明景觀即將取代肩輿、鞍馬與人力車象徵的前現代交通工具。柳北從明治五年(1872)赴歐美遊歷一年餘，歸國後刊行的《航西雜詩》中，也提到搭乘輪船與火輪車的經驗：

汽車烟接汽船烟，四望冥冥不見天。忽地長風來一掃，倫敦橋上夕陽妍。  
頂上晴雷腳底烟，一車入地一車天。中間吾亦車中客，驀過東西陌與阡。  
(〈倫敦府雜詩二首〉)<sup>89</sup>

崎嶇路在老巖間，落月斷雲相對間。恹獸有聲人不語，火輪碾上綠魁山。  
(〈過綠魁山〉)<sup>90</sup>

坐看萬水又千山，百里行程轉瞬間。何事往來如許急，火輪不似客身閑。  
(〈火輪車中之作〉)<sup>91</sup>

客身遠逐汽烟飛，千里風光一望奇。來路未收紅旭影，前山已濺雨絲絲。  
(〈三月十六日發巴里赴伊太利汽車中所得〉)<sup>92</sup>

這些詩描繪泰西文明器物改善了城與城、城與鄉之間交通的情景，對明治五年才有第一條鐵路從東京新橋至橫濱間營運通車，<sup>93</sup>但並未普及的東京居民來說，無疑有耳目一新之感，其釋放出的泰西新世界氛圍，更在當時文壇中別開生面。<sup>94</sup>

<sup>88</sup> 《柳橋新誌》二編，頁十四下至十五下。

<sup>89</sup> 見成島柳北：《航西雜詩》，收入成島柳北(著)、小野湖山(校閱)、成島復三郎(編)：《柳北詩鈔》(東京：博文館，1894年)，頁40。

<sup>90</sup> 〈倫敦雜詩〉第一首與〈過綠魁山〉皆收錄於森春濤(編)：《東京才人絕句》(東京：額田正三郎發行，明治八年〔1875〕刻本)，卷上，頁四上至四下。

<sup>91</sup> 見《航西雜詩》，頁32。

<sup>92</sup> 同上注，頁36。

<sup>93</sup> 相關論述參見藤井明：〈嵩古香の『西游小品』(一)〉，《埼玉短期大学研究紀要》第14號(2005年3月)，頁145-48。

<sup>94</sup> 參見三浦叶：《明治漢文学史》，頁140-42；Maeda Ai(前田愛)，“Ryuhoku in Paris,” trans. Matthew Fraleigh, in *Text and the City: Essays on Japanese Modernity*, ed. James A. Fujii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4), pp. 280-88。

事實上，柳北身處明治維新這個瞬息萬變的時代，雖身為幕府遺臣堅守不仕新朝的原則，但因長期任職報刊界，往往對西方出版業結合攝影技術改善印刷質量與降低成本，西方電信業得以便捷地跨國隔洋迅速傳送精確消息，發出讚嘆：

返魂誰道有仙丹，巧寫其真小鏡團。傾國百年長不老，故人千里忽相看。各家君相一堂會，殊域山川雙眼攢。當日漢宮伝此術，明妃何必嫁呼韓。（〈寫真鏡〉）

無聲無臭電馳奇，一線之絲達西陲。海外書來賴誰腳，空中筆在寫吾辭。交情時隔山河語，邊警豈綠烽燧知。千古鄒翁能取譬，置郵傳命太遲遲。（〈傳信機〉）<sup>95</sup>

〈寫真鏡〉所指的攝影機，〈傳信機〉提到的電報，都呈現衝擊傳統時間與空間概念的西方文明器物，即將漸漸成為市民日常生活圖景。

柳北對火車改變傳統運輸與交通型態的描繪，很容易讓我們聯想到上海《申報》刊出的葛其龍（號龍湫舊隱）的〈乘火輪車至吳淞作歌〉長詩：

我昔曾乘火輪船，萬頃波瀾若平地，我今復乘火輪車，又若平地波瀾沸。先導眾車隨推挽，不假人力為青天，無雲霹靂響黑煙，莽莽騰空上遊人。列坐一室中耳邊，颯爽生長風發軔，乍自虹口始道旁，觀者堵牆似風檣。陣馬不及追瞬息，已經數千里江灣，忽過吳淞來，海天空闊胸襟開，惜哉同游促我返。未得長嘯登高臺，駕輕就熟返故道，捲地塵沙逐飛鳥，一輪旋轉爭天功。開關以來無此巧，吁嗟乎！中原地美多康衢，西人得意誇馳驅，諸公袞袞居高位，早握籌邊勝算無。<sup>96</sup>

詩中生動地傳達了與報刊界關係密切的文人，親身體驗泰西新奇物事的興奮之情，雖然吳淞火輪車終究囿於觀念未開而導致強大反對聲浪，正式通車後，僅三個月就被拆除，不久之後由清廷向英商買回任其鏽蝕。到了1884年，上海文藝界大老袁祖志結束歐游之旅，刊行的遊記《談瀛錄·火輪車記》中對此有更詳細描繪：

舟以行水，車以行陸，舟既可以火輪取捷，車亦何不可？火輪取捷，泰西久已創行，往年曾於中國上海地方小試其端，咸稱精絕。其時沈文肅公立持不可，故未一載即毀去。今乘輪舟從海至義大利拿波利都城，捨舟親試。……其迅速如箭之離弦、鳥之展翼，耳中但聞風聲而已。竭一日之力可千餘里，亦有日夜長行者。每穿山洞而過，雖晝如夜，然當將入洞口時，則以倏乎燃燈，蓋以電氣引火，徧其各車之中也。……車中可坐可臥，可以促膝談心，

<sup>95</sup> 《柳北詩鈔》，卷三，頁2-3。

<sup>96</sup> 見《申報》光緒三年九月十四日（1877年10月20日），頁2。

可以當窗遠眺，頗不寂寞，至足怡情。較之輪舟，既無風濤之險，遂無眩暈之憂。且同一不翼而飛，不脛而馳。人則逸而不勞，期則速而不淹。雖起古人於九原，亦當驚為奇絕。彼駒稱千里，僅一人騎耳。若此，雖千萬人無難立至焉。然則世所豔稱千金市駿者，視此瞠乎後矣！<sup>97</sup>

值得一提的是，這段文本還不自覺地流露出敘述者「身在其中」、融入城市生活的自在自適，悄悄披露了旅居滬上三十多年的老上海人/早期報人逐漸完構的新文明空間意識。同樣的，必須親履其地且參與其中方能「膚觸」實有，逼真感受。王韜於1887年開始在《點石齋畫報》上刊登他二十餘年前壯游歐陸的旅遊回憶錄《漫遊隨錄》，在〈制度略述〉一文也描繪了十九世紀六十年代末葉他在歐土所見的火輪車，說明了在洋人圈子長達十七年，對泰西事物已相當熟稔的王韜，仍然對倫敦利捷的輪車交通有「百聞不如一見」的驚嘆：

泰西利捷之制，莫如舟車。雖都中往來，無不賴輪車之迅便。……車亦分三等，上者其中寬綽，几席帷褥光潔華美，坐客安舒；中者位置次之。……其行，每時約二百里或三百餘里。轍道鑄鐵為渠，起凸線安輪，分寸合軌，平坦堅整，以利馳驅。無高低凹、凸欹斜傾側之患，遇山石則關鑿。通衢大道，平直如砥。車道之旁，貫接鐵線，千萬里不斷。以電氣祕機傳達言語，有所欲言，則電氣運線，如雷電之迅，頃刻千里，有如覲面晤對，呼應答問，其法精微，有難析述者。<sup>98</sup>

可以看出，王、袁二人對火車通訊以「電氣」傳達、一絲不苟的嚴謹鐵道管理的深刻印象幾乎如出一轍。這段話置諸當時還未有鐵路營運通行的中國，自有提供文化參照座標的積極意涵。

總結來說，這些具備西方經驗的中日文人筆下描繪的歐美城市生活樣貌，一來不乏提供讀者域外獵奇的閱讀樂趣，二來更起到文化協商與中介的重要作用。即便未曾親履西土，將當時正處於文化轉接過渡期的時空考慮進去，這些具備報人身份的中日文人，因敏感於接受泰西新知，在傳播新型態知識的過程中有一定貢獻，不僅值得重新關注剖析，更應肯定其人其文所起的文化斡旋作用。

從此視角來看成島柳北的青樓風月誌，與其說是東京遊里與市民消閑娛樂文化的深入導遊書，不如說它展現了新舊時代交接轉型期間，城市知識份子面臨如大軍壓境般泰西文明氛圍的複雜心境。完稿於明治維新初期的《柳橋新誌》二編，透過大量答客問式的對話模式（妓女問、妓院常客問、妓女與顧客問，以及妓院顧客和盲人按摩師之間），較諸《柳橋新誌》初編更採取諷刺筆觸，揭露當時士人一味隨俗追求新

<sup>97</sup> 袁祖志：《談瀛錄》（上海：同文書局，1884年），卷二〈涉洋管見〉，頁十二上至十二下。

<sup>98</sup> 王韜（撰）、王稼句（點校）：《漫遊隨錄圖記》（濟南：山東畫報出版社，2004年），頁94-96。



潮，僅僅懂得西學皮毛便誇誇其談的行徑。柳北曾描述兩位士人至酒樓對飲：「談及宇內形勢，竟論郡縣封建之得失，辯駁移刻而不決，口角吐火，舌頭噴血，酒冷肴爛而不顧也。」<sup>99</sup>數妓坐傍聽而倦，其中兩名妓女起而如廁，相會廊下後埋怨顧客不解情趣，遂決意進而勸說：

〔妓〕問曰：「公等所論果何論？」客曰：「僕等所論，天下之政體，郡縣封建之利害得失，卿等何問焉？」乙屬盃曰：「公等何謬也。夫郡縣封建之得失，秦漢以來先哲論而無遺，今復何俟公等嘵嘵之言哉！妾聞米國有共和之政，極公極明，極正極大，雖唐虞之治，不能過焉。公等宜棄古人糟粕，兩廢郡縣封建之說而徇共和之美矣！且夫遊也者，最要共和而樂。今公等既在酒樓置酒肉而不食，擲管絃而不奏，空論妄言，使妾等向隅催睡，可謂之共和而樂耶？公等真不知遊者，妾將為大統領一振此衰頹之勢，請先吸此罰盃。」於是二客大慚，兩首並肯而謝曰：「謹奉女王殿下之令。」<sup>100</sup>

這裏藉聲色娛樂場所中擅舌鋒的妓女之口，戳破當時新進士人自以為是的政治議論，其中以1853年率武力威脅結束日本近兩百年鎖國政策的米國（即美國）政權的共和之制，來比附在酒樓理當追求尋歡作樂的共和之樂，頗具顛覆意味。文末兩士人尊奉妓女為「女王殿下」，並甘願受罰飲酒，也不難見出柳北在字裏行間暗諷新政後朝野人士歷經全面西化，徬徨於尋求國體與主體定位，卻仍無所適從的轉型期知識份子之心態剪影。<sup>101</sup>

《二編》中另外一則敘述，亦有異曲同工之筆：

一書生入學校，頗通英語。一夕飲柳光亭上，與妓言，半用英語。妓曰：「郎君獨識英語，奴輩不解，是甚無趣，願教奴以英語。」書生意甚得，曰：「卿才子卿才子，若學之數月，必為大家。僕於英語，無所不通，不知卿欲所學何先？」妓曰：「儕輩相呼用常語，似無風致，願郎君先教以奴輩之名。」書生曰：「妙，妙。」妓問阿竹，曰蠻蒲。問阿梅，曰啵啉。問阿鳥，曰弗得。問阿蝶，曰洒孛。應答如響。妓又問美佐吉，書生俯首，百考不得。又問阿茶羅，書生益困，拭汗於其額，曰：「今者僕不携辭書，近日將懷英語箋一部來，以答卿等百般之問。」<sup>102</sup>

柳北於幕末時期就意識到西學的重要性，積極學習外文（英語、荷蘭語）與泰西兵法，<sup>103</sup>《伊都滿底草》中就記載了他在1863年左右閉門在家向幾位熟諳外語的友朋學

<sup>99</sup> 《柳橋新誌》二編，頁十二下。

<sup>100</sup> 同上注，頁十三上至十三下。

<sup>101</sup> 參見前田愛：《成島柳北》，頁428-31。

<sup>102</sup> 見《柳橋新誌》二編，頁六下至七下。

<sup>103</sup> 參見前田愛：《成島柳北》，頁435-37。

習。<sup>104</sup>該書中部份文字段落(喫霞仙客、誰園曼士與烏有居士關於《花押說》的解說)即轉化為上述對話，<sup>105</sup>但情境已自不同，更加凸顯出新舊文化碰撞期青黃不接的社會怪現狀。

有趣的是，同時期的上海學習外文的風潮亦方興未艾，同治十二年(1873)《申報》上刊登洗耳狂人陽湖楊少坪的〈別琴竹枝詞〉，<sup>106</sup>最能曲盡上海洋場光怪陸離文化元素畢集的特徵。此文開頭先說明：「『別琴』二字，肇於華人，用以作貿易、事端二義。英人取之，以為杜撰英語之別名，蓋極言其鄙俚也。」其詞曰：

生意原來別有琴，洋場通事盡知音。不須另學英人字，的里(三)溫(一)多(二)值萬金。算賬先呼押克康，對而(銀兩)大辣(洋錢)即銀洋。辛工(甯人呼為身工)概說為儔四(無薪水束修之別)，是否何人蝦勃郎。雪彈抽乃乘肩輿，開來治倫跑馬車。知否路傍人煞味(知)，錫揩(烟名)斜插任呵噓。好法身而沙法身，如何如此脫羅真。勃郎由(屬你)與勃郎妹(屬我)，是爾是我抑是人。衣裳楚楚語陪陪(略停)，考姆陪陪歇歇來。多少洋行康八杜(當手也，粵人呼為買辦)，片言茹吐費疑猜。清晨相見谷(好)貓迎(晨)，好度由途敘濶情。若不從中肆鬼肆(賺錢)，如何密四叫先生。

文中呈現華人欲通曉英語，以上海方言模擬英文讀音而衍生許多滑稽的揣想與比附。翌年(同治十三年)《申報》二月初七日連載的〈接續別琴竹枝詞〉中亦有如「為因酒也」等等一系列中、英文對照詩文，益發可窺見洋場因貿易鼎盛，華人競學英語的時尚熱潮，以及因而衍生之種種荒謬情狀之一斑。<sup>107</sup>

上述中日文化現象與文本徵狀的分析，皆不約而同展示出十九世紀七十、八十年代的東京與上海已然匯集八方四面之政治、經濟等勢力與充沛能量，更因為處於西潮東漸的前哨站而被迫容納了更為駁雜多元，甚且往往互相矛盾扞格的時代課題。柳北與王韜及同代人的治遊文本或城市敘述，具體說明中日知識份子汲取異國經驗並創造新型態的文化傳繹之緩慢艱辛過程，在舊文化傳統斷裂、核心價值轉異的危機中，卻透過不斷的反思自我創造嶄新的文化契機。

<sup>104</sup> 即桂川甫周、柳河春三、神田孝平與箕作秋坪等西洋學者。見青柳達雄(解說)：《柳橋新誌》，〈解說〉，頁9。

<sup>105</sup> 見青柳達雄(解說)：《柳橋新誌》，頁154；另參見日野龍夫(校注)：《柳橋新誌》，頁393。

<sup>106</sup> 《申報》(同治十二年二月初五日)，頁2-3。

<sup>107</sup> 「別琴」二字應為pidgin的音譯，當時典型的洋涇浜英文，為business的訛轉。參鄒振環：〈十九世紀下半期上海的「英語熱」與早期英語讀本及其影響〉，載馬長林(主編)：《租界裏的上海》(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3年)，頁94-95。另參考周振鶴〈別琴竹枝詞百首箋釋——洋涇浜英語研究之一〉一文的分析(<http://lingualyouth.blogbus.com/logs/1522942.html>)。

## 結語

往昔北里雖盛，柳橋雖熱，未聞有名公鉅卿一遊以嘗其情味。蓋文政、天保以還，幕府禁網極嚴，雖麾下之士，遊則有譴。天朝矯其弊，赦小過，舉賢才，正其大綱，修其大典，如擁花抱柳瑣末之事，釋而不問，故駟馬高蓋有時而三顧蘓小之家。彼公子王孫在深閨中，畢生不能入狹斜之鄉者，一朝放縱，任其所之，若野鶴出籠而飛，洪水決堤而進，其快可知也。校書幫間捧媚而來，朵頤而候，一酌百金，一彈千金，真是一曲紅綃不知數者。夫通下情、解人事者，莫遊若也。貴介搢紳寓深意于遊戲，以察閭巷之情態，則於為治，不為無益。且若泰西諸國帝王同遊于民庶，若花旗聯邦貴賤不殊等，皆是所謂文明開化者。頃歲本邦日除舊弊，力新政教，可不謂美事乎？雖然，徒以酒樓之遊、娼妓之樂為文明開化之道者，余不肯左其祖也。<sup>108</sup>

與前一節所論雷同，成島柳北提及美國（花旗聯邦）時，總不免述及其國中在上位者與庶民「同樂」「共和」的精神，表面上稱許為文明開化的象徵，卻復以新政權成立後青樓冶遊之所迸現的「野鶴出籠」、「洪水決堤」亂象，隱隱預見明治維新後諸多新的時代難題將蜂擁而至。柳北先鄭重申明北里狹斜之遊的「深意」乃是「察閭巷之情態」有助於治國，但卻又在文末自亂陣腳地流露「徒以酒樓之遊、娼妓之樂為文明開化之道者，余不肯左其祖」的心聲，看似與自己先前的「遊以載道」說法自相矛盾。但這段話卻迂迴地呈現兼具詩人與報界聞人身份的柳北及其同代人，一方面游移於傳統與現代間歷經認同困境與文化失衡，憂心傳統文化的精髓與核心價值之淪亡，另一方面在重重危機與迫切感中向讀者揭示出文明進化的嶄新契機及與異文化交融和合的種種可能。

以同樣的視野觀照洋場才子群首要代表人物王韜及其同代人的上海冶遊書，我們發現，他們既透過城市書寫回應西潮，見證啟迪革新的一面，卻依然文人積習猶深，冶遊嗜癖不減，或不免道學家氣味地批判上海城的奢靡浮華面貌，但這些文本呈顯的時代症候，正迂迴而真實地折射出彼時知識社群欲迎接新思潮卻又裹足不前，深恐在融入新思潮之際喪失主體性的不安焦慮。

或許可以說，透過東京遊里與上海青樓向內向外逡望，試圖重構文化語境，爬梳十九世紀七十年代末葉至八十年代上海文藝圈與東京文化界種種文學形式、文化型態及城市想像之類同與歧異，更能具體而微地揭開十九世紀末葉東京與上海做為異域多元文化的輸入港口與東亞文化擴散輻輳地標的時代角色，其間展演的跨國流動、城鄉互動、傳統階級與新興勢力重新洗牌、地方經驗與國際文化交織角力、認知與觀念之生成演化的種種課題，將豐富我們重新理解近代中日文人、報人心態史的多元剖面，揭示出十九世紀中末葉中日文化面臨全球圖景與因而衍生東西文化傳繹的標誌性意義。

<sup>108</sup> 《柳橋新誌》二編，頁四上至四下。

# Philandering, Urban Memories, and Cultural Transmission: Focusing on Wang Tao and Narushima Ryūhoku

(Abstract)

Wen-tsuei Liu

This article re-examin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urban narrative” the philandering writing of the Ming-Qing period and the significance it bears on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especially during the late Qing period. By re-presenting the spatial-temporal context in which the narratives were composed, the paper investigates how the genre, when imported into Japan, cast its influence on modern Japanese literature and *Kanbun* novels. Yu Huai’s *Banqiao Miscellany*, highly acclaimed in the Shanghai literary circle, was particularly noteworthy for the way in which Yu recounted the transformation of brothel-houses on the Qinhuai riverside in Nanjing. Among many of its imitations, Wang Tao’s *Sea-corner Philandering Record* was widely acknowledged as an exceptional work. Wang depicted the change of Shanghai brothels in a language that also evoked great sentiments for his native country as well as his own life. *Banqiao Miscellany* was very well received in Japan. It is believed to have a considerable bearing on Narushima Ryūhoku’s *Ryūkyō Shinshi*, an account in which Narushima also reported the transformation of Yūri, a Japanese brothel area in Yoshihara during the Edo era. *Ryūkyō Shinshi* gives the reader an opportunity to observe how *Kanbungaku* was transmitted or transformed during the late eighteenth century when Westernization was taking place. It also allows us to appreciate how controversial and accommodating, both at the same time, modernity found its way into Japanese culture. In short, works by Wang Tao and Narushima reveal the deep reflection that engaged the intellectuals at the turn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when they were faced with the quick and menacing approach of Western civilization.

**關鍵詞：**冶遊 城市記憶 文化傳譯 王韜 成島柳北

**Keywords:** philandering, urban memories, cultural transmission, Wang Tao, Narushima Ryūhoku